

侨批贸易及其在近代中国与 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作用

——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阐释

[英]班国瑞,刘宏

(卡迪夫大学 历史、考古与宗教系 英国; 南洋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新加坡)

摘要: 侨批贸易是以侨批的汇寄为主要业务,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等为一体的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有些研究认为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

关键词: 华侨; 华商网络; 侨批; 侨刊; 跨国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1-0058-15

DOI:10.14073/j.cnki.nywtj.2019.01.006

侨批是指海外华人移民通过民间渠道寄回侨乡,附带家书或简单留言的汇款。侨批一般包括侨汇与侨信。随着2013年中国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有关侨批的研究也蓬勃发展。侨批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是侨批研究领域最早的成果。早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就从民间收藏家手中收集了一批珍贵的侨批资料。之后,东南沿海的一些侨乡,如福建、广东的五邑等地区也陆续进行了侨批资料的收集和出版。其中,最早出版而且比较齐全的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潮汕侨批集成》(总共为108册)。近几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资料汇编《闽南侨批大全》。侨批申遗成功后,在中国各地也举办了多次与侨批课题相关的研讨会,并出版了一些论文集。一些著名侨乡如福州、汕头和五邑等地区都举办过有关侨批的研讨会,并将研讨会论文集出版。除此之外,从201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侨批的中文著作面

收稿日期: 2018-06-02

基金项目: 南洋理工大学科研项目“多元共生与亚洲可持续发展”(M4081020)

作者简介: 班国瑞(Gregor Benton) 英国卡迪夫大学历史、考古与宗教系荣休教授;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陈嘉庚讲座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世。除了中国学者外,当中也不乏外国学者。例如,日本学者山岸猛的《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论创社 2005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滨下武志教授的近著《华侨、华人与中华网络:移民、交易、侨汇网络的结构及其展开》(岩波书店 2013年)对侨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大量有关侨批的研究中,侨批贸易也顺带被提及,而一些着重于侨批贸易的研究也陆续出现。在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中,较少以侨批贸易称之,更多的是以侨批业为研究中心。当中既有探讨侨批业本身及其制度的演变,也有通过侨批业探讨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侨批业的跨国经营网络等。^①另外,也有以某一个侨批局为个案来研究侨批业的运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下文提及的天一侨批局。^②

而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是希望回应莱恩·哈里斯(Lane J. Harris) 2015年在《亚洲研究杂志》的文章《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海外华人的侨批公司:国家主权的限制与东亚及东南亚的跨国资本主义》特别是对他的结论提出异议。哈里斯这篇文章的结论认为,“跨国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形式,是依赖于非个人规则的信任,而不是一种依靠文化和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侨批商人是通过有效的商业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1]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希望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做出一些其他的解释,他们希望“现代性”可以通过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展现出多元而非模式化的形态,本文也是其中的一项努力。笔者认为族群及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商业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是华人企业家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尤其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的早期阶段,即在对中国没有强烈的个人和文化认同的土生华人力量崛起以前。^③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

一、侨批贸易及其商业模式

支撑侨批贸易的商业文化是建立在亚族群而非广义的中华民族基础之上的。^④这种商业文化顺应了对本地族群的依赖,也是对于族群内部分裂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分裂是伴随着移民链从中国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程希《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批业之视角》,《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80-96页;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57-66页;刘伯攀《20世纪上半叶菲律宾华人与侨批业的发展》,《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论文集)2009年,第453-467页;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70-78页;焦建华《试析近代侨批跨国网络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87-95页。

② 有关天一侨批局的研究可参见蔡良才、黄辉、王文强、林振赐、朱佳佳《天一信局与闽南金融信用文化》,《福建金融》2015年第6期,第60-63页;郑云《闽南侨批业与天一信局的兴衰》,《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53-55页;郑晓光《华侨华人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基于天一信局的个案考察》,《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59-64页。

③ 这里我们不考虑更广泛的种族和身份认同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种角色是随着族群的繁衍而在成熟的海外华人商业文化之中愈加巩固的。

④ Gomez和Benton在2004年对华人种族身份中的亚种族进行了讨论,参见GOMEZ, EDMUND TERENCE and GREGOR BENTON, "Introduction: De-essentializing Capitalism: Chinese Enterprise,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Michael Hsiao (eds.), *Chinese Enterprise,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 1-19. 亚种族概念源于一种人类学的观点, Honig曾在1992年提出疑问,此处仅是为了方便解释而使用,参见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带来的。除了在面对战争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文化很少采用泛华人的形式。即使是为了抵制国家干预而成立的行业协会,也无法取代以“方言”为基础的协会,它们只是作为补充或仅仅充当门面。我们认为,哈里斯高估了他们对于非“传统”部分的重建,尽管他承认他们内部的结构“仍旧显示出一些基于籍贯社群的分裂”。^[2]

哈里斯意识到了侨批贸易的独特性,值得称赞的是他对其中本质主义的减少进行了批判。他拒绝将其描述为“传统中国的”,并认为这是一个属于东方研究学者的错误论述。他指出,尽管侨批局最初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地缘、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由于出现新的通讯手段、运输方式和银行设施,这些侨批局已经发生变化,并逐渐发展成现代商业模式(他称之为“殖民现代”^[3])。根据哈里斯的观点,这种模式代表着文化主义商业实践与资本主义盈利策略的融合,并且能在民族国家、殖民地和帝国三者的间隙中茁壮成长。

哈里斯将侨批贸易定义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在几个方面再做商榷。其中最值得质疑的一点是他提出的,这种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与过去的断裂,而由于出现新的通讯手段、运输方式和银行设施,这种断裂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似乎意味着现代技术与“传统的”结构和价值观是不相容的。这种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技术发展推动并决定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与哈里斯所否定的文化决定论相比,技术决定论同样是一种本质主义。

为了印证他的理论,哈里斯将早年处理汇款的水客与后来更有组织且更复杂的侨批局划分开来。然而,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样,这两种商业形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或者是定性的。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过程事实上应该是渐进的、累积的以及双向的。在从水客到侨批局的过渡中,(顾客的)信任与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过水客也明白顾客的担忧,并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在巴达维亚,水客由当地的担保制度监管问责^①,这种担保制度由殖民地的华人社团代表其客户来进行贸易监管。在侨批局出现以前,很多水客已经开始给客户开具收据了。黄挺对巴达维亚华人公馆《公案簿》的研究(2008)显示,侨批贸易在1787至1846年间已经相当成熟,这些贸易主要依赖于水客。实际上,侨批局采用的——收集侨批,发展关系网,利用代理商、侨批分局甚至邮局,开具收据,同时参与交付侨批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和金融,利用汇水差价等,所有这些旧方法都是从水客那里继承下来的。

此外,不管在时间或空间上,从水客到侨批局的转变从来没有彻底完成。相反,二者在数十年中一直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在偏远地区,水客自始至终都是侨批贸易的核心。水客曾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中国和东南亚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政权而失去一些据点,但是这些据点在战争期间又惊人地复苏了。^[4]当东南亚和其他海外社会中的华人社群,尚未完全建立起信任机制和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体制时,水客及其客户依赖于传统的信任方式(对人)而非某种制度性模式(对物)。由侨批局雇佣的批脚扮演了与水客类似的角色,他们将信件和汇款送到村庄,甚至成为侨批贸易中更持久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侨批局正式出现时,他们复制并延续了早期水客所采用的方法。被哈里斯称作“文化主义客户服务”的程序,对一个原本在本质上是现代的企业而言,其是核心而不仅是“色彩”或点缀。侨批局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员依据“传统”路线经营他们的店铺和业务,仅仅雇用他们自己的亲属和与其有关系的同乡或相同方言群的人。即使在企业技术实现现代化之后,他们与客户的关系仍旧依赖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例如在新加坡,海南人通常都会到海

^① 马来语的“投递者”在“担保者”的语境中,被翻译成中文的安坦。

南人所经营的侨批局寄送侨批,而海南人所经营的侨批局也集中于同一个地方。同样,他们与其他侨批局,与中国或海外的代理人和雇员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才会建立在贸易之上,而即便是这种贸易关系也会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哈里斯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很明确界限的假设提出怀疑。相反,我们认为这两种模式是共存且互相交叉的。

事实上,侨批局从未能完全取代水客。侨批局和水客并存的时间很长,直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才结束了这种局面(金门的汇款店是当时唯一的例外)。此后,水客贸易持续存在,尽管主要集中在缺乏现代道路和机构的地区。^[5]与侨批局相比,水客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加个人化并且私密,他们更熟悉当地的地理、文化和社群(包括海外和中国),也可以发挥更为广泛的功能。此外,水客与侨批局的共存也为客户提供了灵活性和市场选择,迎合了客户们千差万别的、时常多变的需求。^[6]

正如水客与侨批局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同种类的侨批局之间也是一样,尽管它们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及技术水平,但都属于一个统一的连续体。相对少见的纵向组织和看似更为现代的侨批局控制了侨批派遣的三个阶段(海外接收、汇至中国、国内接收——所谓的三盘系统),都是基于更为简单的横向联系,而这一发展路径并非不可逆转。经过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后,大型的侨批局可能会分裂或缩小,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一次发展壮大。规模较小且更为“传统”的侨批局则组成了通过血缘、地缘和方言来维系的密集店铺网络。

天一侨批局作为当时最大且最重要的侨批局,很好地说明了侨批局作为一个机构多变的特征。天一侨批局最初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之上,这种基础与信托制度出现之前的移民链相关。但在天一局随后的发展中,它也通过不同种类的信任关系而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信任关系包括——个人的纽带、关系,以及在20世纪初出现的制度信任。然而,正如研究该公司的一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些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从来都不是线性或单向的。^[7]天一局不采用现代管理、审查和责任制度,坚持家族企业模式(所有的联系和运转都由创始家族郭氏家族严格管理),得以减少交易成本,实现简单有效的管理并且迅速累积起巨额资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行为悄然而至,以“和谐默契”为特征的公司模式不能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种模式也就成为了一种隐患而不再是福利。由于内部监督得不到充分实施,天一局(像其他几家这样的公司一样)成为了贪污、盲目投机以及不同分公司之间竞争的温床。1929年,投机活动造成天一被挤兑,最后导致破产并欠债50万元。

这难道正是哈里斯所认为的,侨批贸易的跨国性通过“工具性的经济实践”使得“文化特征”压倒一切?^[8]这一推论意味着跨国组织不能建立在“相互联系”的基础上。但是,近代中国国内的行会和会馆确实有能力横向发展甚至建立跨国的组织,尤其是在面对国内政府和(后来)外国人插手的情况下。就这一点而言,侨批局在20世纪初开始建立商会,也踏上了这样一条老路。^①例如在新

① 参见 JOHNSON, LINDA COOKE, “Shanghai: An Emerging Jiangnan Port, 1683-1840”,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64-165; CHEN, ZHONGPING, *Modern China's Network Revolutio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 WANG, DI,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 刘宏同样认为“华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种类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来克服这种制度性障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华人通过不断的改进他们的网络,使其实践与价值观与全球化的世界保持紧密相关。”他还指出“与其将这种网络视为建立在文化和族群共性基础上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配置网络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联结,这种联结在空间上处于国家内部,但同时也横穿整个区域;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商业的发展,也在广阔的东亚的政治经济之中。”参见 LIU, HONG, “Beyond a Revisionist Turn: Networks, State,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Diasporic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0, No. 3 (2012), p. 27; 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加坡 就有潮侨汇兑公会、琼侨汇兑公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等组织 其中部分汇兑公会也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商团会员。尽管,“传统”元素几乎存在于这些横向和跨国组织行会的各个方面,但同时它们又是复杂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并且是以贸易而不是宗乡纽带为联结基础的。^[9]这些横向和跨国组织的早期例子推翻了那种认为在正式贸易协会中的侨批局组织 必然不被视为“传统”的观点。

既然侨批贸易极具适应力和弹性 那为什么它最终会衰落呢? 哈里斯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他认为贸易是“灵活的、分散的、如植物根茎一般有组织的网络”,它的“开拓精神和对跨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崇”,^[10]使其能够抵御住国家及殖民者将其纳入监管之下、搞垮它的企图。他接着将 1949 年之后贸易的萎缩以及最终的消亡归咎于政治原因——东南亚的殖民当局和独立政权对中国采取的孤立措施 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

不过,中国和东南亚的各种殖民政府和其他独立的国家 都在试图通过控制邮局和银行来取代侨批贸易,侨批贸易在这种企图面前不堪一击 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原因在于侨批贸易无力与由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特许、支持或控制的组织和公司、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是,他们还是企图通过行业公会这一传统性组织来与国家的现代机构进行抗争。例如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通知新加坡邮政总监 要求增加侨批的邮费。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就同新加坡各华侨团体一起 举行减轻邮费的大会,为侨批汇兑业者请命,迫使政府做出妥协。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期的中日战争和战后的通货膨胀在一定时期内挽救了侨批贸易,水客和侨批局在与现代(主要是外资银行)银行的联合下卷土重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通过中国官方渠道进行贸易对收件人和汇款人都极其不利。虽然,一度出现这种激增,侨批贸易最终还是在 1949 年之后彻底失败了。这种失败不只是在大陆,侨批贸易屈服于强大的政府和侨乡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变化;在金门岛也是如此,它被现代化的银行和邮政服务击败。侨批局与中国银行及邮政系统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是传统主义的,并在根本上具有跨国取向,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和民族国家疆界内运作的现代制度。

二、侨批贸易与侨刊现象

侨批贸易与现代资本主义两者间的关系,可通过对侨刊现象的分析得到阐明。侨刊意为“海外华人的杂志”,其有助于海外华人维持对于祖籍国的想象及从未离开家乡的感觉,从而把海外华人和家乡联结成一个虽分属不同空间却有相同生活体验的共同体。侨刊与侨批贸易相伴出现,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侨批文化的产物,如果说侨批是在私人领域流通的信息来源,侨刊则是在公共领域流通的信息来源。相对于侨批的私人家书的性质,侨刊则被称为集体家书。侨刊现象在 1910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在这一部分中,邮政文化与印刷文化两个概念将是讨论的中心。

“邮政文化”这个术语,是 2013 年加布里埃尔·罗马尼(Gabriella Romani)在研究意大利统一后有关书信情况的著述中提出的。“邮政文化”描述了 19 世纪通过信件而产生的沟通交流,这些活动重塑了大众的生活并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将文字带到了乡村。“邮政文化”创造了“一种民族认同的新地理空间,基于……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的增强(和)……对个人经历的理想化的延伸”。^[11]

当然,这种新文化也是村民向外移民的结果——通常农民视野有限——他居住到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之后,基本上都会扮演一个新的社会角色,例如小商贩或城市工商业的工人、矿工或种植园的工人。在海外,男性移民(偶尔女性也会)参加一些新的社会活动,表达政治观点。以华人为例,东南亚殖民社会以及北美、澳洲和欧洲白人社会中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同情新民族主

义和共和政治 因而唐人街成为这两股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邮政文化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优势:其主要作用是让亲友保持联系,但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信息网络,这种信息网络消除了距离,增强了彼此联系,并使人们接触到“新的思想和习俗(以及)一个比他们居住地更为广大的世界”。^[12]“邮政文化”一词后来被戴维·亨金(David Henkin)运用至美国,他认为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进入了一个环绕着整个国家的交际网络。^[13]然而,这一词却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哈里斯在他关于1896-1949年间邮政系统与现代中国的建立的研究中,曾经简要地提过该词而未做详细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他主要探讨的是邮政系统对于现代国家建立的贡献,而非其在更广阔社会中起到的相反的政治作用。^[14]

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首先提出的“印刷文化”,是一个更为出名并且得到了更加广泛探索和运用的概念。我们从安德森的著作和受他著作启发的其它研究中得知,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高涨与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印刷及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15]

邮政和印刷这两种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对现代邮政服务的定义而得到进一步阐释。托克维尔认为现代邮政系统是“思想间的伟大联系”^[16],是现代通信革命的支柱,同时也是每个国家现代制度、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的核心。^[17]现代邮政系统覆盖了以前几乎没有被中央国家和主流经济所触及的地方以及阶层,除军队以外,它比政府任何其他部门都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因此,他们与报纸一起比大多数“塑造日常生活模式”的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持续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流”进入城镇和村庄,并使平民百姓能够“参与国家政治”。^[18]

在移民和侨批制度的背景下,侨乡的邮政文化和印刷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然而,其性质与罗马尼及安德森提出的理论不同,亦难以达到两位所提出的社会实践模式。

在邮政文化方面,侨批贸易在维护家庭情感联系方面的作用,提高了下层阶级的识字率,也使得移民及其家属(包括男性移民之后留下的女性)更多地参与了国家及当地社会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它符合罗马尼等人提出的邮政文化的条件。然而,侨批贸易缺乏现代邮政系统的基本特征,现代邮政系统在多数国家形成了国家垄断,并根据统一规则进行调整和运作。事实上,侨批贸易制度恰恰相反:它是私人的,并且多样且不受管制。邮政系统确实试图挤进侨批贸易,但通常以失败告终。同时,邮政系统对于国内邮政服务的管理也是间歇性的并且受到限制的。自始至终,侨批贸易都以“方言”和地区划分,并且现今会在区域和方言上再进一步被细分。侨批商人不仅没有发展出全国性的规模,相反,他们积极(并且大部分成功地)抵制发展这种规模,国有化意味着汇款业务转变为官僚国家的一个垄断部门,而这种官僚国家可以是中国,或者是华人所在的国家。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侨批贸易在政治上甚至经济上与国家没有关系,或者没有被卷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巨大政治动员中,但结果上是仍旧没有产生通常意义上的邮政文化。就如同尽管侨批贸易商人有着一致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上的共性,他们也未能完全克服其在社群(subethnic)界线上深深的割裂,做到长久的行业团结。

关于印刷文化,侨乡经验向安德森的理论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挑战。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对安德森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暗示欧洲和美洲是历史上唯一真正的主角,殖民地人民即便连想象的内容也“必须永远被殖民”。^[19]拉狄卡·德塞(Radhika Desai)也批评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下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不需要民族主义的社会学,因为他们只是在模仿或“盗版”一些预先制造的西方模式下的民族性;德塞(在新一版本的论文中)还认为“这些模式最直接的谱系应该追溯到对殖民地国家的想象”。无论哪种批评,安德森的理论都被认为是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研究带去了欧洲中心论和一种西方的概念。^[20]

这场讨论让我们注意到,一种本土的印刷文化得以在移民和侨批体系的背景下在侨乡蓬勃发展。移民和侨乡所在的县级和村级的社区领袖刊发了大量的侨刊,并将其寄给世界各地的侨民,告知其家乡的重要事件并鼓励他们为家乡事业捐款。^[21]虽然,其他侨乡也有,但广东是侨刊出版的主要中心。^[22]1949年以前,仅五邑地区就出版了超过200种侨刊。许多是月刊,有些是每两周甚至每周一刊,这些侨刊几乎全部都是由侨民资助出版的。^[23]

这些侨刊包括“由个人、家族、学校、村庄和政府机关出版的新闻通讯、报纸和杂志”。据一份早期的报道,这些侨刊中五分之四是寄送至国外的。^[24]1908年,第一份侨刊《新宁杂志》在广东台山出版。它通过维持或重建联系、交换信息,特别是有关台山的信息——存在的问题、发展情况、综合性的新闻和历史(特指“传统习俗”)来满足移民及其家庭和社区的需求。

侨刊现象在20世纪10-3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3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性更明显的侨刊,它们支持抗日运动,并募集捐款以支持国防。1945年开始,大部分侨刊在战后恢复出版,但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只有少数侨刊幸存下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些侨刊在号召捐粮、捐物和吸引侨汇方面发挥了作用,随后它们在文革期间陆续消失。1978年侨刊开始复兴,每年印制数百万册,但政府明显干预了此次复兴,主要是希望吸引外资。^[25]

“侨刊”展示了侨乡当地充满活力的印刷文化,它强有力地补充了由侨批贸易开启的区域邮政文化。侨刊是与侨批相对应的公共的产物,它是社区性而非私人的,因而它们被海外华人称为“集体家书”。^[26]事实上,侨批和其他通信是侨刊及乡村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27]“侨刊”以当地或该区域为重点,尽管有少数侨刊(如《新宁杂志》)是县级性的,它们更多的是服务于乡镇或宗族。不过它们也在政治危机期间,超越了自身的特殊性而为国家做宣传。因此,侨刊与侨批文化与国家导向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通过捐款和广告,侨批商人向侨刊提供经费支持。《新宁杂志》中约70%的广告是侨批局以及其他汇款公司刊登的。^[28]银号、侨批局、商号以及其他与侨批贸易相关的公司则负责海外侨刊的发行,并担任出版商的代理人。^[29]

这些侨刊是否说明了这是中国人在侨乡对西方印刷文化进行了借鉴,就像从19世纪开始,现代报纸在中国以及海外的唐人街扩散那样?基本可以肯定它们不是。与定期公开发行的报纸不同,大多数侨刊都是私下且不定期发行的。对他们来说,一个更有可能的模式是中国数百年来书写本地和家族记录的习惯,即所谓的家谱、族谱、宗谱^①,以及提供县级及其以上地区关于当地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信息的方志或地方志(当地的地名录),这些记录都旨在帮助当地政府管理并且促进地方认同。^②侨刊复制了这些存在于宗亲组织,以及宗亲社团与县之间的出版物的分类方式。传统上来说,大多数家谱产生于社会中最富有的一部分人,因为他们能够承担印刷费用。家谱展示并象征着一个属于强大家庭或亲属团体的资格,它们的出现往往标志着,正式血缘关系组织在一段时间的减少后的重新恢复。在某些情况下,家谱“创造了有组织的亲属团体”,而非相反的情况。家谱具有排他的私人性:他们的作用是向后代传递家庭或宗族的历史、家庭或宗族的祖训,为后代设立道德礼仪标准,并记录家庭或宗族事务中的辉煌事件。城市化和内部迁移并没有削弱家谱的书写,而是强化了它的存在。^[30]

① 关于宗谱的记录,参见 MESKILL, JOHANNA M, “The Chinese Genealogy as a Research Source”, in Ai-li S. Chin and Maurice Freedman (eds.),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39-161。

② 关于地方志,参见 ZURNDORFER, HARRIET THELMA, *Chinese Bibliography: A Research Guide to Reference Works about China Past and Present*, Amsterdam: Brill, 1995, pp. 187-195。

侨刊与家谱、族谱、方志之间的类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根据定义,家谱和族谱是由单一的家族或分支控制,而许多方志则是由与地方政府或更广泛的社区有关系的团体出版。这些出版物与侨刊的融资和制作方式不同,也不一定履行相同的职能。然而,侨刊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它能够在侨乡的几个层级兴办,从县向下到村、到宗族,同时它们的某些分层与当地更早的宗亲出版物相对应。

上述的联结、共性以及部分等同性,反映在用于描述一些较早的移民相关出版物的术语中。一些刊物的名称反映了其角色和起源,包括乡刊、族刊和乡讯;有些名称结合了“现代”和“传统”(例如,“乡刊乡讯”和“侨刊乡讯”)两个变量。^[31]

另一方面,侨刊的捐助者也认识到侨刊、侨批和族谱的亲密关系。如前文所言,侨刊有时被称为“集体家书”。1926年,《颍川月刊》上刊登的一首诗将侨刊比喻为“家书”或“族谱”。^[32]因此,这两种出版传统不仅相互联系,同时也获得了实践者的亲身体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继续被研究侨批现象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专家所认同。

为了理解这种关系,有必要回顾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时期,大量记载法律和制度的传统,这种传统深深扎根于乡村。^[33]地方社区会在家谱和方志中记录他们的活动和组织章程。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被打上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历史的烙印,对海外汇款的依赖塑造了当地的移民文化。虽然,侨刊在某些方面与家谱和方志不同,但它仍然是当地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家谱记录了家族或宗族的起源、排名、分支和名人及其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地方志按年代记录了当地社会的历史和情况,包括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移民寄回家的侨批创造并孕育了一个包涵了移民者和国内亲属的跨国综合领域,并帮助保留了两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的传统方式。

传统上,编纂家谱和本地历史是当地士绅成员的工作,他们拥有必要的技能以及社会经济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在侨乡,跨国移民企业家在许多方面扮演着与过去从事地方事务和公共管理的传统士绅相同的角色,^[34]无论是通过海外远程控制,还是在这些人再移民之后。他们还协助编纂出版“侨刊”,对华社和侨乡的社会事务表达书面的看法。

有些侨刊在中国出版(如《新宁杂志》),有些在国外出版。^[35]侨刊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报道移民链两端的华人社会、政治和文化相关的事务,这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部分。侨批反映了家庭和宗族事务,包括买房或建房、婚礼和婚姻,宗族财务和其他的相关利益;侨刊反映了地方和国家事务,包括政治形势和国家法令的变化。

像家谱和方志一样,侨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地方、宗族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由于移民潮,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社会变成了跨国的:它跨越了侨乡和海外华人定居地区,所以它的文化传统既反映在侨批和侨刊,也反映在家谱和方志中。例如,饶宗颐编纂的《潮州志》中有专门关于侨批贸易的部分。^[36]侨乡的大多数家谱也都列出了海外家族或宗族成员的名字。如新加坡著名潮汕贸易商林义顺的次子出生于新加坡,但在广东澄海祖籍地的家谱中亦对其有详细的记载。^[37]

在侨乡,普通人的日常事务虽可延伸到海外,但始终扎根于本土。对于移民那代及其家属而言,海外和本地亲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两个部分。这个整体仍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侨批和侨刊在这种动态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侨批巩固了家族与宗族之间的纽带,确保了亲属关系和当地社区的维系。^①另一方面,侨刊协助维护国家机构和地方政权,其内容反映了国家或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通过侨刊,移民对侨乡当地和全国的形势保持密

^① 即使当男性移民海外,他们依然能够行使父权。通过海外汇款的方式,他们能够执行家庭和宗族的工作任务并且参与对于宗族组织的管理。

切的关注,并能够参与到中国及家乡社会秩序的建设和维护当中去。

中国学者希望探索横跨侨乡和移民社区的跨国社会,因此使用了各种资料和出版物。许多学者在研究移民家庭和宗族时,使用族谱和侨刊作为补充材料,以获得对于亲属关系系统更加全面的认识。^[38]家谱、族谱、地方志、侨批、侨刊都是相似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在探索海外华人与家乡之间的联系及其出版物时,是无法将“传统”与“现代”二者割裂的。

因此,20世纪初期侨刊的出现与现有的地方出版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创办侨刊,彰显了家族、宗族或社区在移民的特殊环境下所获得的财富和权力,或是显示了侨乡因为移民和海外汇款而获得的更高的地位。与旧式家谱相似,侨刊可以标志或者加速对新的宗族支系(因为侨批而致富的)的进一步吸收。他们向任何有资格获取侨刊的人免费分发,对于海外的对象,则使用邮寄的方式。^[39]这是对移民的回应,也是防止移民与家乡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机制。就像侨批贸易一样,20世纪初期侨刊的出现代表了固有的传统在海外新环境下的一种创造性适应。

在国外,侨批贸易与其同时发展的新式现代报业密切相关,这种新式现代报业与侨团、侨校一起,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1815年,据说华人报纸第一次出现在国外(马六甲),到了1996年,至少有4000种华人期刊在52个国家和地区以中文和其他语言出版,并且至少还有200本由华人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出版。^[40]在泰国,第一份中文日报创建于1903年,后来又有65家成立。这个日报在全盛时期与侨批局系统或多或少地联手,侨批局所有者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来招募客户,而记者也对贸易进行报道,二者互相为推动对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业主利用媒体宣布其店铺搬迁至新址(由于扩张和商店火灾而频繁发生)、特别优惠、中国或泰国当局实施的新法规、新货币政策、结业或者开业。在抗日战争初期,他们用报纸提醒中国人,日本企图控制利润丰厚的汇款贸易。^[41]

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行的侨刊,如《新宁杂志》,是对1895年中国战败于日本以及1898年改革运动失败的回应。一开始,他们支持一个共同的国家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至少在一些时期证实了“印刷资本主义”理论。在政治危机期间,“侨刊”超越了特殊性而为国家进行宣传。因此,侨刊、侨批文化之间与国家导向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而永久的分界线。然而,侨刊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通过保持联系和交流本地信息来满足移民及其家庭和社区的需求。它们使移民、返乡移民和回乡的人在回到中国后,可以互相交流见闻,“正如他们曾经在同一市场所做的那样”。^[42]

徐元音(Madeline Hsu)在对“侨刊”的研究中曾提及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理论,并在一个脚注里评论道,安德森提出关于“印刷资本主义”在使“‘思考’国家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阐明了侨刊在分散的台山社区中的作用。^[43]然而,她的研究表明,这个比喻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安德森将第三世界视为西方国家模式的复制品,但徐元音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个据称是印刷媒体建构的“想象社区”比建立在效忠基础上的社区更加难以成熟起来。“就像由籍贯地定义的社区一样”。^[44]多数侨刊都是以地方或区域为重点的单一出版物。如《新宁杂志》的主要关注点是建立一个“更好的台山”,尽管这个目标与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并没有冲突,国家政治仍旧不是这种出版物存在的理由或者甚至一个持久的关注点。

《新宁杂志》最初比多数侨刊更加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在清政府倒台后,它的政治倾向明显降低,并被进一步纳入县级政治中去。它作为“乡村新闻报纸”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被国民党控制,迫使其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和计划。这种政治欺凌使得美国的台山侨民逐渐疏远,他们选择“忠于他们的家乡要甚于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呼吁”^[45]。只有当日本侵华的威胁日益

严重时,才重新唤起了他们对祖国政治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倾向更明显的侨刊来支持抗日运动,并募集捐款以支持国防。然而,移民对祖国事务的关注度,最终还是随着他们及其后代的关注焦点转移到海外而再次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破坏,即使是与籍贯地的联结也会被逐渐磨损。^[46]

1945年开始,大部分侨刊在战后恢复出版,但在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只有少数侨刊幸存。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些侨刊在号召捐粮、捐物以及吸引侨汇方面发挥了作用,随后它们又在文革期间陆续消失。1978年侨刊开始复兴,每年印制数百万册,但政府明显干预了此次复兴,主要是希望吸引外资。^[47]

三、资本主义与侨批贸易

哈里斯认为,侨批贸易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而是一种“自由放任的跨国资本主义”,它奉行资本主义的盈利战略,并且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客户服务文化”,而这些服务模式是其国营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48]另一方面,在福建和广东地区,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深深地扎根在传统以及与之相连的信任关系之中,这种情况确立了侨批局和汇款人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汇款过程一部分的侨批局与商号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侨批局之间的关系。当现代银行体系和现代邮政服务在中国和海外华社出现时,侨批商人利用了这些机构的优势,这对商人来说是有利可得的。侨批商人一方面适应侨乡和海外华社的社会变化实行新式的业务实践,一方面与其建立合法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互相作用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信任形式的综合系统,即将植根于社会关系中对人的信任与和立足于市场的对制度的信任进行了整合。然而,前者始终是二者中更为主要的。

侨批贸易也因以下特点而被进一步界定:严格而专有的区域性本质、“富有人情味的”和专业性的扩散以及多样性。由于跨越区域的界限会削弱交易所需的集中的信任,它的区域主义在较大的侨批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时候也会呈现于较小规模的侨批局。人情味一开始就覆盖了整个侨批和回批的过程,甚至到后来把银行和邮局作为中国和外国相互汇款的过渡渠道之后,收款人和交付者也保留了这种亲密和情感元素。它的多样性——参与许多相互关联的商业和社会活动形式——支撑其广泛嵌入于中国和华人社会之中,以及一些相互交叉、联结和重叠的社区和商业网络(包括区域和跨国)之中。

华人经济文化在文献中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根植于华人社会的儒家观念,成为一种单一民族刻板印象,这种经济文化被认为只有通过受到外部冲击而进入现代世界。然而,侨批贸易的研究开始改写中国通向现代主义的历史和过程。这种重写重新唤起了有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特殊性质的旧观念,这与地区政治的新趋势密切相关,现在并被政治体系所包容,相对于地区差异,这种政治体系曾经对同质化更加感兴趣。

若不是中国政治的变化,这种改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僵化地集中,毕竟也从未似苏联那样集中过。地区差异和政治文化从未完全被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一系列革命所消灭,一些新的差异和文化却因此产生,尤其是在拥有自己革命派别和传统的东南省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中,由于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权力日益下放,地区差异化也加深了。现在,地方和区域的核心特色被强烈地展现,而非继续隐藏起来。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而东南部的一个明显特色是其移民史。

在中国正在向外开拓更多海外市场的时代下,这是一个特别有用的特征,地方领导人可以利用其来加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兴起的侨批研究,必须放在这种史学区域化以及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去理解。此外,最近在福建和广东复兴的例外主义,也为侨批贸易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再被归类到现代资本主义轨道之中的新解释。^①随着中国经济、行政和政治决策权日益下放,旧的地区政治开始重新获得牵引力,新的政治认同逐渐出现。

让侨乡广东和福建的历史学家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声称的数百年来海外航行和移民历史作为特殊符号已经被刻在了两省的文化中。根据他们的分析,与世界上其他有大量人口离家奔向海外的地区和国家一样,在国外冒险谋生的传统使得广东和福建人和他们的文化更为外向,而不是狭隘地着眼于内陆。侨批历史学家将黑格尔对世界的分类方法复兴,黑格尔将世界分为河流的(河流)、内海的(内陆海洋)和海洋的(他从卡尔·施米特的哲学地理学中借鉴了这些类别),以此来对应亚洲、欧洲、英格兰和美国(或古代、中世纪、现代)。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不从事航海的国家(如中国)不了解自由并且陷入停滞和迷信,而海洋人民则富有无穷的创造力和勤劳,像海洋一般是一个“自由的元素”。^[49]他们是明智的、勇敢的、超越的而不是封闭的和保守的。^[50]

侨批历史学家将这一划分延伸到中国的沿海和非沿海文化之中。黑格尔认为中国是“神权专制王国”,^[51]而追随黑格尔理论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过去有海洋文化,现在必须重新恢复它,他们暗示面对海洋的那些地区从未失去过这种文化。一项研究将中国南方人民描述为“具有海洋特征的民族”,充满着“海洋文明”。^[52]在使用这些标签时,这些历史学家暗指东南沿海相较于国家其他地方的优越性,特别是福建,没有通道与内地相连,这个地区直到最近才结束因为高山而与中国内陆的隔绝。还有广东,一个离中国内陆中心地区停滞和腐败文化最远的地方。

根据刚刚复兴的区域学,南部的福建人无畏而英勇,这种性格几百年前曾使福建的汉族先驱们攀越许多危险的山峰而到达该地区。他们的精神是“无惧而勇于冒险……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53]闽南人有时被称为“中国”或亚洲的“犹太人”,福建学者自豪地接受了这一绰号。^②至于侨批管理者,他们是“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海洋英雄”。^[54]这种对企业和向外开拓的关注与中国当前所倡议的,建立一条通往西方的“新丝绸之路”相一致。然而,当北京关注恢复穿越中亚的北方线路时,东南部的战略家讨论的是复兴“海上丝绸之路”或“水上丝绸之路”,而侨批贸易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55]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也认为,福建和广东的海洋传统不只是外国模式的复制品,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他们认为,它是一个综合体,包括一些由(汉族)先驱带往南方的中原文化,汉族来福建前就有的本土文化和海洋文化。在世界航行并在海外建立华社的闯劲打破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禁忌“父母在,不远游”,但它并没有导致华人切断与故土的纽带。在这方面,中国的英雄与“英国海洋英雄”非常不同。他们在实现了征服大自然这一人类“永恒的愿望”的同时,也看重他们对祖先、亲属和朋友的责任。事实上,一开始作为家庭的代表离开故土出海的行为,正是出于他们对家庭的忠诚。由于宗族制度、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以及长辈对移民的控制(将女性留在家中),中国向国外的探索反倒加强了而非削弱了他们与家庭的联系。侨批是这个链条的一个主要联结。

这种海洋的属性植根于东南省份不寻常的历史之中,早在唐代(618-907)时当地人就已经在海

① 这类研究中的一个例子是第一辑的《中国侨乡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16篇文章中,有3篇文章的作者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机构,其他的3位来自广西和浙江,同样也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主要侨乡。

② 这一绰号同样用于形容温州人,他们是东南沿海另一个因为贸易而在国内出名的群体。

外进行贸易和定居了，^[56]在南宋(1127-1279)中国经济南移之后更是如此。^[57]明清时期，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的港口有时正式向菲律宾和泰国开放私人以及公共贸易。当地商人在整个东南亚航行，在整个地区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大并且更为多元化的跨国运营网络。^[58]当政府实施“海禁”以控制海盗并且防止出现自给自足的海洋经济时，这些商人对此不屑一顾，于是“四大洋成了他们的家”。^[59]“海洋经济”在前现代时期，在13-18世纪蓬勃发展，中国商人仍然成功地与欧洲商人在东南亚竞争，即便当时中国朝廷否定他们。然而，直到现代，它仍然继续影响着中国南方商人的思想和眼界。^[60]

研究侨批贸易的历史学家称，该地区私营贸易发展的程度导致了一种新的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并没有将商人贬低到传统社会分类中被鄙视的第四类，即士、农、工、商相反，本地人甚至会钦佩这些商人。^[61]作为支持东南地区具有独特性的主要代表，饶宗颐教授认为潮州的商业文化“指引”了该地区的海外探险历史，这种文化同时也是“海运洋务文化的产物”。^[62]

因此，研究侨批的学者为侨批贸易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谱系，而不是一个由技术发展导致的向现代资本主义横向同化的结果。相反，它的根基和力量来自于数百年来在福建、广东、东南亚和太平洋活跃的中国企业之中，这些移民商人以及某些情况下他们在当地出生的后代，调动了他们的文化资本以及在祖籍地的文化和家庭亲缘关系来经营业务。尽管有着明显的“传统主义”，侨批现象揭示中国企业家能够在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获得成功，与中国和海外的现代化国有银行和邮政服务机构竞争。在面对政府对其在中国、新加坡、泰国和其他地方贸易的打压，动员支持侨批机构可以看作是全国和跨国(或海外的)华人移民觉醒的一部分表现。虽然主要是经济，他们同时也有很大的政治潜力，以及与故乡保持纽带的深厚情感内涵。他们不仅强化了移民的国家认同，而且通过使在各地的中国移民聚焦于同一个问题，在海外华人社会创造了新的团结的意识。这种活力和广度，只有20世纪30年代华人在东南亚的抗日动员活动才能与之匹敌。而且，他们创建的跨国联系和身份认同也为跨国抗日运动提供了基础和样板，这种运动在20世纪30-40年代遍及东南亚的华人群体。^[63]侨民通过侨批和侨批贸易^①与中国保持的联系，表明“与故乡发生联系是由众多瞬间构成的”，这从方法论上再次确认了接触海外华人的重要性。^[64]

总之，这些发现再一次表明，不仅仅只有“一种现代性”或者一种“现代化构想”，也表明欧洲以外的现代性之路并不是对欧美国家创造出的“模块化”形式的重复，也不是一个与它们相融合的过程。^[65]虽然，侨批贸易与西方经济组织形式和营利活动交叉，并且相互作用，侨批商人往往运用新的西方技术来发展其跨国业务，但他们是在有着结构、文化和制度前提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地区和国家历史及传统所塑造的环境中，创造性地挪用了这些技术。这种适应和选择性挪用的过程，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和跨国的动态过程，虽与其他现代社会有共同点，但它也极度依赖中国的内部文化和体制资源。

(本文原文为英文，改写和翻译过程得到康婉盈、董佳如、朱庆、张慧梅等人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① 有关侨批贸易的更详尽分析，参见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Dear China: 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 1820-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GREGOR BENTON, HONG LIU, HUIMEI ZHANG (eds.), *The Qiaopi Trade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2018。

注释:

- [1][2][8][10][48] HARRIS, LANE JEREMY,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Firms: The Limits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850s-1930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4, No. 1 (2015), p. 146, 143, 130, 146, 146.
- [3][14] HARRIS, LANE JEREMY, *The Post Offic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1896-194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2, pp. 32-33, p. 181.
- [4] 廖耘、吴二持《侨批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关系》,见王炜中编《第三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第268页。
- [5] 黄家祥《诏安侨批业流变》,见王炜中编《第三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第503-504页。
- [6] 杨群熙编《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汕头:汕头市图书馆 2003年,第57页。
- [7] 贾俊英《近代闽南侨批局信用的嬗变:以天一局为个案的考察》,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论文集》,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2014年,第140页。
- [9] 张明汕《侨批业者肩负历史使命》,见洪林、黎道刚《泰国侨批文化》,曼谷:泰国学会丛书 2006年,第100页。
- [11][12] ROMANI, GABRIELLA, *Postal Culture: Reading and Writing Letters in Post-Unification Ital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 4.
- [13] HENKIN, DAVID M, *The Postal Age: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6, 93.
- [15] ANDERSON, BENEDICT R. O'G,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 [16][18] JOHN, RICHARD R, *Spreading the News: 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 pp. 4-13.
- [17] MACLACHEN, PATRICIA L, *The People's Post Office: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Japanese Postal System, 1871-20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 [19] CHATTERJEE, PARTHA,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in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3.
- [20] DESAI, RADHIKA, "The Inadvertence of Benedict Anderson: Engaging Imagined Communities," *Asia-Pacific Journal*, March 16, 2009, p. 14.
- [21] WILLIAMS, MICHAEL, "In the Tang Mountains We Have a Big House," *East Asian History* 25-26, 2003, p. 104.
- [22][24] 刘进《民国时期五邑侨刊中的银信广告》,《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33页。
- [23] 刘进《五邑银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5页;梅伟强、梅雪《“集体家书”连五洲——五邑侨刊乡讯研究(1978-2005)》,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 [25][47] HUANG, CEN, MICHAEL R. GODLEY, "A Note on the Study of Qiaoxiang Ties," in Leo Douw, Cen Huang, and Michael R. Godley (eds.),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1999, pp. 313-319; 姚婷、梅伟强《百年侨刊:〈新宁杂志〉历史文化论》,台山: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
- [26] HUANG, CEN, MICHAEL R. GODLEY, "A Note on the Study of Qiaoxiang Ties," in Leo Douw, Cen Huang, Michael R. Godley (eds.),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1999, p. 317; 刘进《五邑银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5页。
- [27] 黄安年《重视侨刊乡讯研究》,2014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788201.html> (登录时间:2015年5月2日)。
- [28][42][43][44][45][46] HSU, MADELINE Y, "Migration and Native Place: Qiaokan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of Taishan County, Guangdong, 1893-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No. 2 (2000), pp. 307-331, p. 313, p. 312n11, p. 326, p. 325, p. 328.
- [29] 刘进《民国时期五邑侨刊中的银信广告》,《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33-34页;姚婷:

- 《侨刊中的侨乡社会与“侨”“乡”网络——基于1949年前新宁杂志“告白”栏目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24页。
- [30]MESKILL, JOHANNA M, “The Chinese Genealogy as a Research Source”, in Ai-li S. Chin and Maurice Freedman (eds.),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41-143.
- [31][39]姚婷、梅伟强《百年侨刊: <新宁杂志>历史文化论》，台山: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年，第1-5、6页。
- [32]梅伟强、关泽峰《广东台山华侨史》，台山: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年，第289页。
- [33]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8-9页。
- [34]陈春声《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的转型: 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年10月29日，第334-348页。
- [35]吴以湘编《潮州乡讯》1949年第2期第4卷，新加坡: 潮州乡村社; 新加坡顺德同乡会编《顺德侨刊》1948年第2期，新加坡: 顺德侨刊社。
- [36]饶宗颐编《潮州志汇编》，香港: 龙门书店，1965年，第870-871页。
- [37]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第70-76页。
- [38]袁兴言《微观空间史角度解读“金门薛氏族谱”及“显影”中的竹山村》，2010年，<http://www.nqu.edu.tw/up-load/edusf/attachment/c930ccc96d692e2ca8159e10589060b1.pdf> (登录时间: 2016年5月5日)。
- [40]BENTON, GREGOR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pp. 192-193.
- [41]蔡金河、许光华《试论泰国华文报对泰国侨批业的贡献》，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档案研讨会论文集》，汕头: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第365-370页。
- [49]HEGEL, GEORG and WILHELM FRIEDRICH, [1821]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by Allen W. Wood, trans.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68-269.
- [50]郑有国《黑格尔“海洋文化”阐释》，《闽商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60-69页。
- [51]HEGEL, GEORG and WILHELM FRIEDRICH, [1837]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by Ruben Alvarado, Aalten, Netherlands: Wordbridge Publishing, 2011.
- [52][54]苏文菁、黄清海《全球化视野下的侨批业: 兼论侨批文化的海洋文明属性》，《闽商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40页。
- [53][61]吴鸿丽《初析闽南侨批文化》，见王炜中编《第一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367、362页。
- [55]RANA, PRADUMNA B., WAI-MUN CHIA, “The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s (Land Connectivity) in Asia,” *RSIS Working Paper*, No. 274, Singapore, 2014; 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2页。
- [56]马楚坚《潮帮批信局与侨汇流通之发展初探》，见王炜中编《第一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20页。
- [57]王炜中《潮汕侨批》，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 [58]陈训先《论“银信合封”》，见王炜中编《第三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83-186页。
- [59]罗则扬《侨批文化与海洋文化》，见王炜中编《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汕头: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第208-210页。
- [60]张林友《侨批档案与闽粤近代金融史研究: 基于史料比较的分析框架》，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档案研讨会论文集》，汕头: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第226-227页。
- [62]陈训先《侨批业与潮汕文化源》，见王炜中编《第一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 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68页。
- [63]陈丽园《侨批与跨国华人社会的建构》，见王炜中编《第三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64-180页。
- [64]CHAN, SHELLY, “The Case for Diaspora: A Temporal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74 , No. 1 (2015) , pp. 107-128.
[65] EISENSTADT , SHMUEL N. , “Multiple Modernities ,” *Daedalus* , Vol. 129 , No. 1 (2000) , pp. 1-29; EISENSTADT , SHMUEL N. , WOLFGANG SCHLUCHTER , “Introduction: Paths to Early Modernities - A Comparative View ,” *Daedalus* , Vol. 127 , No. 3 (1998) , pp. 1-18.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康婉盈、董佳如 译

[责任编辑: 吴 桐]

The *Qiaopi* Trad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Gregor Benton LIU Hong

(Cardiff University , UK;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essay takes issue with the idea that the trade in remittance letters (*qiaopi*) was a modern form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that relied on trust in a system of impersonal rules rather than “a distinctive form of ‘Chinese capitalism’” dependent on cultural or familial affinities , and that *qiaopi* traders used instrumental economic practices to transnationalize their businesses. The essay aims to identify alternatives to modern capitalism that are , at the same time , robustly cosmopolitan , and for which modernity is multiple rather than modular. Ethnicity and identity matter greatly in diasporic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 as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 and creativity ,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iaspora formation. Far from forming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business familism , social networks , and their associated cultural values can be shown , at least in some periods and contexts , to have assis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eties at home and abroad , by enabling social mobility , furthering family interests , building partnerships , facilitating contracts , and promoting other practices proper to a modern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 *qiaopi* trade , *qiaokan* ,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